

秦汉西晋中央与
巴蜀地方关系研究

杨民
著

秦汉西蜀中央与

巴蜀地方关系研究



四川大学“211”工程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巴蜀文化史系列

刘复生 主持

秦汉西晋中央 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

杨民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 / 杨民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ISBN 978-7-80752-833-3

I. ①秦… II. ①杨… III. 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四川省
—秦汉时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983 号

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

杨 民 著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7
字 数	17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33-3
定 价	1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巴蜀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巴蜀”一般是指今四川盆地以及部分相邻地区，西部为蜀，东部为巴，无论在地缘上和文化上二者都密不可分，人们也习用“蜀”来概称四川或巴蜀。古代的巴蜀是众多民族的活动舞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邈远的古蜀国吸引着世人的艳羨目光。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巴蜀地区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巴蜀文化”这一表现地域特征的概念应运而生。80年代以来，随着三星堆、金沙和三峡等地的重要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中华多元文化中占据有重要地位。其渊源流变、发展道路、构成特色，与周围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对祖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等，都需要予以重新认识。

在古代，“巴蜀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同时又是不同民族、不同族群文化交流的结晶。“巴蜀文化”最初主要是就其考古意义上而言，随着战国晚期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日益加强，“巴蜀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文化系统，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秦汉以降至于明清，甚至到更晚的近代，随着各地“移民”的不断流

动，不同类型的的文化大量传入，不仅巴蜀居民的构成不断发生变化，巴蜀文化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其复合型特点更为突显，形成了巴蜀地区自古及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巴蜀介于黄河、长江中华民族这两大母亲河之间，母亲永不枯竭的乳汁和钟爱，是巴山蜀水充满灵气的源泉。汉初蜀郡太守文翁首创官学，赢得“蜀学比于齐鲁”的美誉；赋于思辨特征的“易学”在巴蜀所表现出的深厚传统，儒士们发出“易学在蜀”的感叹；“蜀多方士”之说彰显了巴蜀文化特重数学、医学等社会与生活技能的这一特征；“天数在蜀”则是对自先秦以来巴蜀士人精于天文学的一个恰当总结。炳耀千秋的词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无不得灵感于此山水之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谚形象地反映了苏轼文章之学的影响，现存《华阳国志》则是中国早期最成功的区域文化史著作。后世的巴蜀继承了“崇实”、“尚文”、“重史”这一文化传统，风姿绰约，学脉不断，直至近现代。

在千百年历史中，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总是涌动着无尽的活力：在《山海经》传说时代，巴蜀是“天下之中”；战国秦蜀守李冰吸取巴蜀民众的智慧，筑建起了都江堰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从名列战国时六大都市之一的成都，到唐代“扬一益二”之赞语，再到世界首张纸币“交子”的诞生地，陶醉四方的蜀井、蜀茶、蜀馔、蜀酒，孕育其中的巴蜀文化究竟藏有多少秘密？都吸引着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这里无意“总结”巴蜀文化，然而她所散发出的恒久魅力，或许可以从中感知一二。

近几十年来，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饱含着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追求。然而，探索没有止境，巴蜀文化的园地如今正繁花似锦。作为巴蜀文化的研究重镇，四川大学学人秉承先贤追究



巴蜀文化底蕴的宏愿，在“211”重点工程建设中，设立“巴蜀文化”研究方向和“巴蜀文化史”系列丛书，努力发掘、继承和弘扬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巴蜀文化之锦，精心织造，再添新色。

刘复生

2007年6月

緒論

论题缘起

巴蜀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①。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巴蜀地区是中国南方早期的文化中心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出高度的文明。同时，由于巴蜀地区四面环山，在古代同外界特别是中原地区^②，交通相当困难，但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并不能阻隔巴蜀地区与外界发生密切的联系，以及相互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后，巴蜀地区被秦国军事征服。随着以郡县、官僚、

① 古代中国西南在习惯上被分为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巴蜀地区包括四川盆地和盆地边缘的一些地带，西南夷地区则包括巴蜀以南和以西的西南地区。从历史上看，巴、蜀两地既是自然地理区域，也是社会政治区域，两地历史文化各有独自的渊源谱系。不过由于二者地理位置毗邻，以及战国以来文化上的联系和共性增强，讨论四川古史，习惯将巴、蜀联系起来，或把二者相提并论，作为一个经常性的表述对象。

② 本文提到的“中原”是泛指，有时指黄河流域一带，即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区域。有时就是指中央朝廷及中央朝廷所在地的代表性文化和意识形态，或所谓“主流文化”。实际上，与巴蜀对应的，尤其地理意义上“中原”也是多元的，包含着许多区域性的文化；特别是西汉大体承续着战国的区域性文化差异。而晋代分裂后的“中原”更多是指特定的具体中央朝廷及其代表性文化和意识形态，象征性超过实际，有时甚至已失去原来的意义。

赋税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经制度的逐步推行，此前巴蜀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轨迹被明显改变，开始了作为“地方”的长期历史进程。

秦灭巴蜀之后，发生在巴蜀地区的行政管理、文化控制等活动明显，巴蜀本地人与外来者存在着多层面的接触，彼此形成不同的认知。东晋时蜀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一书，记述了巴蜀地区的地理沿革、物产风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驳斥汉晋时期中土人士对巴蜀地区认知中的误差和偏见。任乃强先生在校补《华阳国志》时提到：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落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肥遯不出。此巴蜀与中国古代隔阂之实际情形也。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方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①。

秦汉以来，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各地从战国时代继承的地区性倾向始终存在，即便政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治、文化上处于统一中央的控制之下，不同区域之间人文风俗、社会意识的差异，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①。汉晋时期中土以蜀士见轻、蜀人以中土为远的现象，即说明当时中原与巴蜀之间的文化隔阂和距离，并没有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接触得以迅速消解。

巴蜀居中国西南之地，长期受到中原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西南地域的文化特质，因此其历史文化兼具封闭性和开放性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特点。“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任乃强先生所指出的巴蜀历史这一发展现象，说明秦汉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以来，巴蜀地区与中原之间，在政治和文化等层面，一直存在着难合易分的敏感关系。

秦汉至西晋，是中央王朝开发和控制巴蜀地区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政治循环的第一个大阶段^②，它奠定了南北朝以后巴蜀与中原融为一体的基础。因此，在这一前后六百余年的时段内探讨巴蜀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文化关系，不仅有助于揭示巴蜀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复杂面相，深化对巴蜀政治、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为探讨中国政治统一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区域与整体关系，提供一个比较典型、具体的实例。

^① 早期中国风俗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情况，在《礼记·王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记载。有关研究可参谭其骧：《中国时代差異和区域差异》，《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域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孙家洲：《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台北）《新史学》第十一卷二期，2000年6月，第1—38页。

^② 参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40—55页。



既往的研究

对于巴蜀地区古史的研究，古代的研究多限于古史的考述与乡土古迹的纪录。真正以近现代方法研究巴蜀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1929年广汉三星堆一批玉石器的出土，引发了有关巴蜀历史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古代巴蜀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考古学和民族学方面。对巴蜀地区的族属、地域以及巴蜀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等问题讨论得较为广泛和深入^①。80年代以后，巴蜀地区古代史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新的研究成果除了对古代巴蜀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外^②，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前期资料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地方通史性的著作增加。这些地方通史著作，多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分板块对巴蜀历史进行论述^③。另一方面是有关巴蜀史专题性质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这些论著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巴蜀古史中的

① 有关研究综述可参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第3—22页。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② 有代表性的整理包括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2007年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刘琳、王晓波点校，线装书局，2003年。

③ 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版的通史性质的四川地方史著作有：陈世松等：《四川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世松等：《四川通史》（全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

若干问题^①。由于论题的关系，本书需要探讨的是秦汉至西晋时期巴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变动状况。下面就本人所见，对涉及此方面的相关研究作一大体回顾。

秦国对巴蜀的征服，是巴蜀地区真正作为“地方”的开始。冯一下、罗开玉、罗二虎对秦人在巴蜀地区的控制和开发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他们发现，商鞅变法以来在秦本土施行的土地、工商管理等制度，已经在巴蜀地区开始执行，但秦廷多因巴蜀旧俗而利导之^②。韩国学者金秉骏和美国学者 Steven F. Sage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较为集中地记述了古代巴蜀的历史面貌以及巴蜀文化融入秦汉时代中国文明的历程^③。宋治民从考古发掘材料分析，认为大约在西汉中期，古代巴蜀的文化基本绝迹，原来的巴人、蜀人在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乃至社会意识诸方面都已融入汉文化中^④。

段渝在《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一文中，从政治、经济、社

^① 在前期资料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2001 年，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巴蜀文化系列丛书”一套 10 册（不详列），以专题的形式对巴蜀文化进行探讨。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也在 2004 年编撰出版“巴蜀文化研究丛书”一套 6 册。除了考古发掘报告外，涉及考古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年；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宋治民：《巴文化与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 年第 3 期；等等。

^② 罗开玉：《秦在巴蜀的民族政策试析——从云梦秦简中得到的启示》，《民族研究》1982 年第 4 期。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说青川秦牍、“成亭”漆器印文和蜀戈铭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冯一下：《战国后期至秦朝四川地区民族融合的基本趋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作——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89 年。罗开玉：《论古代巴蜀王国的桥形铜币》，《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3 期。罗二虎：《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

^③ 参金秉骏：《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及秦的郡县控制》，段渝校译，《中华文化论坛》1998 年第 1 期。Steven F. Sage, Ancient Sichuan 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④ 参宋治民：《巴蜀文化的消失》，《巴文化与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51—278 页。

会组织、移民以及文化等方面，对秦汉王朝改造巴蜀的情况作了论析，深化了学界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方政治与文化变动的认识^①。王子今着重从秦代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的层面，分析了蜀文化与秦文化在战国秦汉时代趋于一统、逐渐融合的诸多现象^②。

秦末至汉初的政治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深刻影响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李开元在研究汉初军功集团形成这一问题时，提及刘邦集团兴起于蜀、汉过程中的地缘因素^③。西汉建国以来，考察中央朝廷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及效果，主要集中在对蜀郡太守文翁的个案研究上。余英时、李开元、林甘泉对文翁“循吏”角色的争议，反映出学术界对巴蜀地方官员群体的研究仍需要加强^④。

秦汉以来中央朝廷对巴蜀地区的持续经济开发^⑤，致使汉代巴蜀地区社会繁荣，刺激了蜀地文化的活跃和人才兴盛。在西汉入仕中央的蜀人中，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成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现今文学界对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作品的研究，成果都已十分丰富^⑥。其中，

① 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37—43、123、260—264页。

④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216页。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222、283页。林甘泉：《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有关文翁的研究，可参何汝泉：《文翁治蜀考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4期。王金义：《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刘耀辉：《“文翁讲学图”象砖介绍》，《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胡兰江：《文翁礼殿图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房锐：《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⑤ 关于巴蜀地区在秦汉时期的开发，可参郭声波：《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姚乐野：《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系，2004年。

⑥ 近年来有关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研究综述，可参踪凡：《汉赋研究基本课题的回顾与前瞻》，分别刊于《洛阳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和2007年第1期。

许结《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徐复观《扬雄论究》、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万光治《蜀中汉赋三大家》、李天道《司马相如赋的美学思想与地域文化心态》、程世和《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等论著，对汉赋与巴蜀地域文化之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①。王文才所著《两汉蜀学考》一文，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对汉代巴蜀地区的学术人物及其学术成就做了比较详细的收集和整理^②。

公孙述、刘备、李特等政治势力在巴蜀地区建立政权，自立“中央”以抗衡中原政治势力，构成了汉晋巴蜀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面相。对于这些外来势力据蜀期间的活动，较为综合的研究有胡志佳《两晋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央之关系》、曹乙帆《两汉魏晋时期西南地区之研究》、王中平《汉晋分裂时期巴蜀政权研究——以人才进用及其社会结构为主》等论著^③。其中，关于东汉末年蜀地政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耿立群、刘增贵、伍伯常、毛汉光、李兆成、田余

^① 许结：《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徐复观：《扬雄论究》，《两汉思想史》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0—333页。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李天道：《司马相如赋的美学思想与地域文化心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程世和：《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万光治：《蜀中汉赋三大家》，巴蜀书社，2004年。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王文才：《两汉蜀学考》，巴蜀文化丛书编委会编《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99—351页。

^③ 胡志佳：《两晋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央之关系》，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8年。曹乙帆：《两汉魏晋时期西南地区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王中平：《汉晋分裂时期巴蜀政权研究——以人才进用及其社会结构为主》，台湾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其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董超：《论李特兄弟领导的武装斗争及成汉政权的性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张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有关三国时期蜀汉史的研究，可参张大可：《建国以来三国史研究述评》，《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406—435页。



庆等学者多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外来割据势力与巴蜀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①。

巴蜀地域文化历来多受学界关注，除了顾颉刚、郑德坤、徐中舒、缪钺、蒙文通、饶宗颐、童恩正等先生有深入论述外^②，近年来对汉晋时期巴蜀文化有集中研讨的重要成果包括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袁廷栋《巴蜀文化》和《中国文化通志·巴蜀文化志》等论著，特别是卢云《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把巴蜀地区放在全国的框架内，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论述了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学术、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的历史面貌及区域特征，对于汉晋巴蜀地区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分析得较为细致^③。

① 耿立群：《蜀汉对西南的统治与开发》，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3分册，1990年，第527—577页。伍伯常：《方土大姓与外来势力：论刘焉父子的权力基础》，《汉学研究》第19卷第2期，2001年，第201—218页。毛汉光：《三国权力的社会基础》，《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9—140页。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亮用人》、《蜀史四题》，《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0—207、213—243页。

②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发表，收入顾颉刚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巴蜀书社2004年重印。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后收入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后收入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饶宗颐：《西南文化》，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1分册，1974年，第173—203页。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重庆出版社1998年再版。

③ 袁廷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袁廷栋：《中国文化通志·巴蜀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关于巴蜀区域文化的有关研究还可参郑月梅：《春秋战国之巴蜀文化》，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85年；许秀美：《巴蜀神话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

对于东汉以来巴蜀地区文化的研究，早期道教是一个重点。向达、蒙文通、王家祐、卿希泰等先生都注意到了五斗米道与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①。张勋燎先生则利用考古材料来探讨早期道教来源与中原的关系^②。姜生在《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一文中，侧重对道教兴起的思想史背景以及与官方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③。对于西晋巴蜀地区天师道的状况，唐长孺先生在《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对成汉政权中的种族、宗教因素进行了考证^④。另外，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陈国灿《略论汉魏时期的巴蜀学派》、焦桂美《蜀汉经学家及经学著作考论》、王永平《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等论著，也对东汉以来巴蜀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讨论^⑤。

① 向达：《南诏史略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172页。蒙文通：《道教史琐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315—333页。王家祐：《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道学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外的研究可参钱安靖：《试论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8—279页。江玉祥：《试论早期道教在巴蜀发生的文化背景》，陈鼓应主编《道教文化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3—337页。

② 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3—266页。有关此问题的进一步论证另见张勋燎、白彬：《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1—330页。巫鸿：《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485—508页。罗二虎：《东汉画像中所见的早期民间道教》，《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近年来有关道教起源的研究可参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

④ 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第155—162页。另可参段玉明：《范长生与巴氏据蜀关系再探》，《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⑤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285—320页。陈国灿：《略论汉魏时期的巴蜀学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王永平：《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焦桂美：《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理论学刊》，2005年第6期。焦桂美：《蜀汉经学家及经学著作考论》，《管子学刊》2006年第2期。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重点关注内容

通过以上研究史的大体回顾，可知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秦汉至西晋时期巴蜀地方历史的探讨范围逐步扩大，研究程度逐渐加深，所取得的成果亦不断增多，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仍有不足之处。许多研究成果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由于在研究中多凸显“地方”的视角，因此对于巴蜀历史上许多人物活动和事件所产生的时代大背景，特别是这种大背景对于巴蜀人物活动和事件的潜在性影响，常常重视不够。至于地方通史性的著作，由于受到编写体例的限制，所以往往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多从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分章分节展开叙述，所论问题面面俱到却不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并存这一历史场景及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因而所做的研究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深刻性。

要避免静态、孤立和片段地研究秦汉至西晋时期的巴蜀历史，需要寻找此时期巴蜀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在脉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联系巴蜀地区所处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大背景来讨论。我们观察到，秦汉到西晋时期政治上的统一格局，决定了巴蜀社会的许多变化，与中央在地方的有效治理和强力扩张有密切联系。另外，由于中原政局变动等因素，导致了公孙述、刘备等巴蜀地区分裂割据政权形成，直到出现下一次的全国政治统一。这种统一与分裂政局的循环，构成了汉晋巴蜀历史演进的基本背景。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秦汉统一王朝时期的“国家”，还是割据势力自立的“国家”，其执政者都或多或少